

中國哲學史

第一冊

任繼愈主編

人民出版社

238

1/1-3

中國哲學史

任繼愈主編

第一冊

先秦部分

中国哲学史

第一册

任继愈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18,000字

1963年7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3版

1979年3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162,001—262,000

书号 2001·114 定价 0.71 元

再版说明

本书出版以来曾经收到广大读者和哲学史工作者许多宝贵的批评和建议，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哲学史研究指示的再学习，我们深深感到书中有些论点不够确切甚至有错误，需要做认真的修改工作。1972年毛主席号召要读几本哲学史，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在此书的基础上修改编写了《中国哲学史简编》，并计划着手进行本书的全面修改工作。但是因为万恶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大搞为帮所用的影射史学。致使本书的修改工作也受到干扰，未能顺利进行下去。目前由于时间和人力一时尚难安排妥善，因此，尚不能进行全面的修改工作。故此次再版仍照原版印出，仅作为读者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参考材料。

本书第四册（清代至近代）是于1973年编写的，作为对第一、二、三册的继续和补齐。

本书对前三册中某些不确切的、错误的观点有所纠正。例如编者改变了原来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看法，我们改写了关于《老子》一章。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提供了过去不能解决的哲学史研究资料，使我们纠正了由于资料不足而做出的不正确的结论，我们增加了《孙臆兵法》一章。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我们增加了汉初《黄老哲学》一章。以上这些改动由于来不及全面改动，作为附录，分别附在有关各分册的最后，供参考。

本书出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遭到了“四人帮”对哲学史的捣乱破坏,把本来已基本澄清的一些问题又搞乱了。我们重新写了《绪论》,对中国哲学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澄清混乱,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本书第一、二、三册(商代至明代)是在1961年至1964年编写的。当时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三个单位部分同志。

参加第四卷及《绪论》及增加的章节编写工作的有(按姓氏笔划为序)孔繁、汝信、任继愈、李泽厚、阎韬、杜继文、余敦康、林英、周继旨、钟兆鹏、楼宇烈同志。刘苏同志负担了抄写、校对工作。

编 者

1978年9月20日

绪 论

哲学史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认识的发展进程,看到各个哲学派别的斗争和转化,学到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古往今来,各阶级、各流派的哲学家都重视哲学史的研究,从哲学史中汲取精神营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都对哲学史做了深刻的研究。今天学习哲学史有什么意义?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它?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如何?在这儿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学习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

学习哲学史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知识的最高总结,同时也是以往哲学全部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的高峰,但是这个高峰不是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认识的许多低级阶段,逐步成长起来的。翻开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泰利斯以来欧洲哲学的发展,给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提供了思想前提,使黑格尔有可能把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前进一步,他们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正如没有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文明的发展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没有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因此，只有了解欧洲哲学的整个历史，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列宁曾精心阅读了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在《哲学笔记》中他深有感慨地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可见理解黑格尔，理解以往哲学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哲学思想的批判总结。要理解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但要懂得马列，还要懂得中国哲学史。如毛主席的《实践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做了光辉总结。不了解历史上的争论，就不能理解《实践论》的重要历史意义。

学习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更好地批判“四人帮”。地主资产阶级为了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不遗余力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但他们手中没有什么象样的货色，一贯从哲学史上拾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烂，冒充“最新的”哲学到处兜售。因此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哲学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在欧洲出笼，重新宣扬康德、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哲学。工人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如德国的伯恩施坦、俄国的波格丹诺夫之流，把它们奉为至宝，拿来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列宁在

批判第二国际和俄国修正主义者时,对康德、贝克莱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外反动派十分恐惧,抬出孔教、国粹来进行对抗。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又鼓吹什么新理学、力行哲学、唯生论等等,借助孔丘、朱熹、王阳明、以及韩非、张居正等人的亡灵,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此,毛主席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曾给以毁灭性的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中,完全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衣钵,用最陈腐、最反动的封建主义毒素反对马列主义。林彪尊儒,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和唯心史观。“四人帮”尊法,贩卖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服装不同,骨子里完全一致。“四人帮”掌握宣传大权的时候,用他们伪造的“儒法斗争史”冒充中国哲学史,利用什么“尊法批儒”,无耻吹捧自己,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他们反动的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就直接在哲学史领域内进行。事实证明,现实的阶级斗争与哲学史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研究哲学史,能够进一步学会识别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什么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更好地掌握哲学斗争的规律,认清反动哲学的阶级实质和血缘关系,这样就能更深刻地批判封、资、修和“四人帮”。而研究中国哲学史,对于揭穿“四人帮”的历史伪造,批判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肃清他们散布的封建毒素,有更直接的作用。

学习哲学史,可以增加历史知识,深入理解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可以吸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高思维能力。这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必要一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在中国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的多次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对哲学思想的发展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地主阶级哲学为维

护封建的生产关系所起的实际作用。这样就使我们对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有更具体的理解。从认识论来说，我们可以在哲学史中发现许许多多由于认识的直线性、片面性、主观性而走上唯心主义的生动事实。这不仅能使我们清楚地指出唯心主义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更好地对它进行批判，而且使我们得到了理论思维的宝贵教训，在探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时，避免唯心主义的错误。

二、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

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是整个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哲学史的任务是通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同一的研究，揭示人类认识日益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无比正确。同时，通过对哲学思想根源的探求，说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这是哲学史特有的对象和任务，是任何其他学科的历史，如政治思想史所不能代替的。然而“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用儒法斗争取代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制造了严重的理论混乱，把中国哲学史搞得一塌糊涂。

坚持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对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思维与存在，哪个是第一性的？对这个问题彻底的、明确的解决，从古到今只有两种。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先于精神，唯心主义认为精神

产生一切。这就是哲学史上的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基本路线。承认哲学史上存在着唯物唯心两大基本派别，就是承认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一生坚持这条原则，对那些口头上叫嚷无党性，实际上鼓吹唯心主义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为哲学史的对象，是尊重哲学史的基本事实，也是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不但对哲学史研究是必要的，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党派性的论述，关于唯物唯心的科学划分，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基本观点，为广大人民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它们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它象一面照妖镜，使一切与革命人民为敌的妖魔鬼怪现出原形。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哲学和哲学史上首先攻击哲学的党性原则，因为只有抛弃了这个原则，他们才能混水摸鱼，贩卖唯心主义。“四人帮”正是这样，他们公然把“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这个唯物主义原则诋毁为“反动的形而上学”，他们大搞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射史学，因此容不得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作为对象的哲学史，一定要把哲学史弄成什么“儒法斗争史”。他们这样干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反动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暴露。

“四人帮”的“儒法斗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事实上也是虚构的。儒法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建设封建政权，如何实现全国统一的争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硬把它说成奴隶主阶级与地主阶级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事实上，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形成是自发性很强的过程。由于奴隶的起义和逃亡，奴隶来源枯竭，奴隶劳动已经不能给奴隶主带来利益。他们被迫改变剥削方式，使奴隶制让位于有利可图的封建制。近年来的

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封建制的形成期,只能早于春秋战国时代,而它的立法期当在春秋战国之交。史书上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是在税收制度上承认了封建制。但是在这两个时期都没有什么复辟反复辟。儒法斗争是在战国中期出现的,距封建制的立法期已经二百多年,离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期就更远,难道他们如此迟钝,直到这时才感到有必要进行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吗?当然不是。他们关心的不是历史的陈迹,而是当时政治的中心课题,即封建国家的政体和全国统一的问题。

其次,“四人帮”还歪曲了包括儒法在内的百家争鸣和百家融合的过程。儒法在先秦不过是“百家”中的两家,此外还有墨、道、名、兵、农等各家。各家之间和各家内部都曾有过程度不同的斗争。“四人帮”硬说先秦百家实际上只是儒法两家,把其他各家削足适履地纳入儒、法“同盟军”的框子中去,或干脆排斥于哲学史之外。先秦时期本来十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丰富多采的哲学思想,被歪曲、篡改得单调干瘪,面目全非。百家争鸣孕育着百家融合,儒法斗争走向儒法合流。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各派学说本来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到了秦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形成之后,融合已成为地主阶级的迫切需要。汉统治者接受秦亡的教训,采取“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的两手策略,推动百家迅速融合。到了汉武帝时,出现了董仲舒哲学,在儒家礼治、德政的基础上,综合法家的法、术、势思想,形成统一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从此,儒法斗争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四人帮”以矛盾的斗争性否定同一性,矢口否认儒法合流的历史事实,捏造出“延续二千年”的儒法斗争史。

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四人帮”不顾历史事实,把儒法斗争从先秦引向今天,引向共产党内。胡说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法家”的先进、革新的“传统”,“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传统”的“继承

者”，就是现代的“法家”；和“法家”对立的还有一个儒家的保守、反动的“传统”，一大批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就是当代的“儒家”。他们大肆宣传“儒法斗争”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行他们“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倒革命老干部，实行篡党夺权。他们的“儒法斗争”的要害也就在这里。

三、哲学史的方法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要坚持阶级分析。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是在阶级社会里发生发展的，虽然它离经济基础最远，它跟经济基础的关系往往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模糊不清，但是联系毕竟是存在着的，归根结底，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因此任何一种哲学总是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总是代表着（有时是公开地、直接地，有时是隐晦地、间接地）特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我们在考察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过程时，一刻也不能脱离阶级分析。在万象纷纭、充满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要迷失方向，堕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沼。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历来反对阶级分析。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些人不敢公开攻击阶级分析，便在暗中进行破坏。“四人帮”惯于以极左面目出现，推行极右路线。在阶级分析问题上，他们装扮成阶级分析的行家，用非阶级观点的大棒打击别人，但背后采取种种卑劣手段，使阶级分析成为抽象的空谈，彻底地败坏它。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承认阶级观点，就要

承认经济决定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承认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但“四人帮”恰恰相反，“阶级分析”对于他们仅仅是用来进行诈骗的面具，他们贩卖的是主观精神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在“四人帮”御用文人笔下，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而是儒法两家的思想斗争决定的。社会制度的更替、朝代的兴亡、政治的治乱、战争的胜败，无不取决于“儒法斗争”。他们说，秦的统一是由于“法家路线”的贯彻，而灭亡是因为“法家路线”的中断；刘邦战胜项羽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汉初的兴盛是尊法的结果；“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红旗》1974年第10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唯心史观取代唯物史观，使“阶级观点”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分析。

思想决定历史是为英雄创造历史找借口的。“四人帮”把法家路线吹得神乎其神，很自然地就把“法家人物”捧到救世主的地位。因为法家路线的制定靠“法家”思想家，而推行、贯彻则离不开“法家”帝王。哪一个帝王喜欢并听信了“法家”学说，重用了“法家”思想家，“法家路线”得到贯彻，于是国家兴盛，天下太平，“黔首讴歌”；如果帝王听信了儒家学说，重用了儒家人物，“法家路线”中断，“法家人物”倒霉，于是国家衰亡，天下大乱，百姓遭殃。这不仅是林彪“天才论”的翻版，而且是它的更恶性的发展。在“四人帮”御用文人笔下，帝王将相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只是体现“法家路线”的走卒、群氓。他们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总是一定生产方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因此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生产方式是发展变化的，这就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发展变化的，不是

凝固不变的。因此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必须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决不能用僵死的公式去范围无比丰富的历史。“四人帮”恰恰不是这样，在他们捏造的历史中，一个抽象的“儒法斗争”的模式囊括一切，贯通古今。他们不仅在地主阶级中划分儒法，在资产阶级中划分儒法，甚至在共产党内也要划分儒法，荒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被他们指定为儒家的集团和个人坚持保守路线，被指定为法家的集团或个人则坚持进步路线，这两家为着千年一贯的路线，进行千年一贯的斗争。这种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不受经济发展程度、生产与交换的性质、方式制约的“阶级斗争”，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不择手段地歪曲事实，把写了不少尊儒诗文的柳宗元、王安石描绘成“大法家”，攻击申韩的王夫之也被说成“法家”。

一个社会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即这个社会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矛盾，是贯彻该社会始终，决定该社会性质的，是不能调和的。在封建社会，地主同农民的矛盾就是这样。而压迫阶级内部，譬如说地主阶级内部，也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但这些矛盾都不是基本的，而是从属于地主同农民这个基本矛盾的。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农民起义危及整个封建政权的情况下，是可以调和的，地主阶级各派会联合起来向农民进攻。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常识，但“四人帮”硬是向常识进攻。他们认为主要的决定性的阶级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倒是次要的从属的东西。儒法之间不可调和，地主与农民却不一定势不两立，他们甚至是可以合作的。“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断言，只有儒家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法家则是“爱人民”的。“儒家路线”激化了矛盾，造成农民起义。农民反儒而尊法，农民起义是为推翻儒家统治，为“法家人

物”推行“法家路线”开辟道路。蒲鲁东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范畴的时候，一律把它们分为好坏两方面，主张去掉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他的目的是鼓吹阶级合作，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四人帮”与蒲鲁东如出一辙，所谓尊法反儒即拥护好地主反对坏地主，其实质是宣扬阶级合作，宣扬农民对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阶级调和和阶级投降。这样，“四人帮”就把阶级观点、阶级分析彻底葬送了。

不但要研究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对哲学思想的影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仅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知识，也概括了生产斗争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研究阶级斗争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固然重要，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同样不可忽视。三大革命实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源泉。实践出真知，实践出哲学。三大革命实践对哲学的发生发展都起决定作用。探讨每一历史时代自然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关系，这是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部哲学史告诉我们，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形态都与当时的生产力、自然科学水平相适应。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着自己的形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各经济部门都依靠手工劳动，工具也都非常简单、原始，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便决定了人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完全依赖于有限的日常经验。因此古代的唯物主义必然是素朴的、直观的。同时由于没有分门别类地研究世界，人们习惯于从总体上，从联系和运动中观察客观世界，当时的唯物主义学说把世界描绘成能动的、相互联系的、发展变化的，这便使这

些学说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迥然不同，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为了推翻反动、愚昧的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治，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坚持、发展了唯物主义学说。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已经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落后的了，哲学家们建立起符合近代科学发展水平的机械唯物主义学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工业交通等部门逐步实现着从手工劳动到大机器生产的过渡，这便推动着自然科学不断进步。在自然科学领域，与机器制造、航海等有关的数学、力学、天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却还处在萌芽状态。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根据最发达的科学——力学的观点，把世界看成一部大机器，把动物和人都看成机器。根据这个理论，他们否定了作为宇宙主宰的上帝，也否定了脱离肉体的灵魂，但是把一切运动形态归结为简单的机械运动，则是当时唯物主义哲学的严重缺陷。不仅如此，那时的各门科学都收集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中就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孤立的静止的，是事物的堆积，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无限的发展过程。这就使机械唯物主义虽然在个别问题上胜过朴素唯物主义，但对世界的联系和发展的理解却低于朴素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史和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创立的。但是只认识这些还不够，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与十九世纪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能量转化、进化论三个伟大发现有密切关系。各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揭露了自然界的辩证本性，严重地冲击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刻注意自然科学进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这些成果，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十九世纪科学的进步，自然界还象以前的科学家说的那样，一成不变，恒古如斯，那么在这无比保守的自然界面前，怎么可能建立起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呢？还应该看到，科学的进步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使哲学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的哲学都是“科学的科学”，在自然哲学这一部分中，为了从总体上说明世界，不得不以幻想补科学之不足。但是现在自然科学对许多现象都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依靠自然科学本身已经能够形成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比较完整的宇宙图画，这样，自然哲学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哲学再没有理由作为科学的科学而存在了。辩证唯物主义只研究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了。

当然，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影响绝不是刻板的、机械的。对自然科学提供的思想材料，理论思维可以做出不同的概括。进步阶级或阶层的理论代表，特别是其中一些善于吸取前代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对辩证思维规律有所了解的人，在某些方面有可能超越当时科学水平，提出较高的哲学思想。同样是在没有近代自然科学的条件下，古希腊的德谟克里特提出了原子论，中国汉代的王充倡导了元气自然论。他们用理想的一般物质解释世界，克服了用某种具体物质解释世界带来的一些困难。在形而上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在物质和运动，肉体和精神，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辩证法思想，批判了把它们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念，有力地捍卫了唯物主义学说。应该指出的是，因为没有自然科学作基础，他们的一些观点只能是天才的猜测，其中也还包含着一些错误的见解。可见即使是这些杰出的人物，归根到底也还是受自己时代生产力和科学发